

# 对瑶族牛的历史考察

任 博<sup>1,2</sup>, 曾雄生<sup>2</sup>

(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10;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牛于古代中国意义甚大,在生产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往研究多着眼于汉族,对于瑶族牛的历史状况考察甚少。为了更好的展现瑶族农业历史,从瑶族牛的获得,牛的用途,牛的数量,以及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阐述分析。厘清了瑶汉关系,指出瑶族牛的问题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配的严重倾斜,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左右。

**关键词:**牛;汉族;瑶族;资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08)01-0054-04

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驯养野生动物,以替代人力承担繁重的劳动,或满足口腹之欲。瑶族四处迁徙,一山食尽又迁一山<sup>[1]</sup>,居无定所,奔波颠沛。所养家禽家畜数量有限。见于史料的有:牛、鸡、猪、羊、狗。此文于家禽家畜中着重论述牛。盖牛于古代中国,意义甚大。

## 一、瑶族牛获得的途径及其历史背景

牛的来源在史料<sup>[2]</sup>中多次指出:或是政府作为诱饵望瑶族受招安而赠牛于瑶,或是瑶已招安犒赏赐牛。皆是政府安抚行为。前者可防患于未然,后者可亡羊补牢以图覆辙之不重蹈。

瑶人之牛,从史料中得知,有以下几种用途:

### 1、牛的交换价值

首先以牛交换紧缺食品——盐。如“惟将……牛……售以获利”<sup>[3]</sup>。瑶人缺食盐,常用山货以物易物直接换取。这里,也不排除售牛获利,以购食盐的可能性。

一种家畜之所以可间接的变成等价物,用以交换、流通、判断事物之价值,往往在于其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牛作为劳动力,是对人力的补充,而亦有其它畜力或者劳动工具可以代替牛力;且瑶人水田以及可供耕种平地极少,牛利用率相对就较低,作为肉食,可有其它禽畜或野生动物替代补充,而食盐几无替代品。所以,牛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于瑶人是低于食盐的。于瑶人

言,以瑶区实用价值低之牛易瑶区实用价值高之盐;于平地汉人或其它平地民族而言,以己相对实用价值低之盐易己相对实用价值高之牛。双方各取所需。

另外要判断其事物是否可以凭一己之力而生产培养。牛只需尽心饲养,便可长成。食盐之生产于瑶人却力所不及。瑶人于食盐,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凭借自身无法直接从自然界中提取获得,必须寻求外部社会帮助方可。养牛为易行之事,而食盐为难得之物。行易行之事,而至无可行之事之成果。“牛”在这里,成了“君子善假于物”中之“物”。

最后,当牛和食盐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流通时,必然受到市场形势左右。牛的数量相对较多,史料中提及“多至十百头”<sup>[4]</sup>而食盐于瑶人,则实属稀缺。物以稀为贵,以众多之牛换稀少之盐,是符合市场交换者的心态的。以牛换食盐,卖牛者为瑶民,买牛者为拥有盐之非瑶民。虽各取所需,但是,卖者为别无选择,而买者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自己饲养;二,从非瑶民处购买;三,从瑶民处购买。当同在交易时,具有多种选择方即处于优势。可见,这是买方市场。且瑶民至汉区交易,不悉商经之道;“口不二价”,也使买方略占上风。

牛换食盐,主要是由于资源稀缺,以及资源

分配受权利控制所造成的。强势者掌控了某些资源,就搭住了弱势者的命脉。

## 2、牛的食用价值

牛除了交换,亦有食用价值。

欲食之必先屠之。在古代中国,杀牛是不允许的,而《过山榜》中屡次提及瑶人“杀牛不告判”<sup>[9]</sup>。瑶族独享此特权,有其特殊原因。这两道榜文分别发于贞观二年、贞观三年。唐对瑶政策较为宽松,唐政府视瑶为化外之民<sup>[6]</sup>,既无视其存在,自然不理其事。另,唐瑶无赋役或减税输。瑶人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政府对税米者又施行半输政策<sup>[7]</sup>。汉族牛主要用途为耕田,是生产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增强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好的粮食作物收成,朝廷也可多纳进更多“税米”。但唐瑶人不税不役,或少税不役,收入多少与朝廷纳入关系不大。准许瑶人杀牛食牛,可以增加瑶人的食物种类,丰富食物来源。从客观上讲,缓解了瑶人食物匮乏状况,可起到稳定瑶人社会之功用。所以,“杀牛”亦不必“告判”,这并非额外的宽恕,而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

瑶人杀牛,有以下几种场合:发骨时、卜时、候客时<sup>[8]</sup>。所谓发骨,即瑶人葬后再次掘骨而出易以小函将之挂于大树上或置于岩洞内二次葬之过程,此过程间屠牛酿酒。本文认为,这与瑶族耕地紧张有关,若建坟墓于平地,则有浪费之嫌。而瑶区多山多树木,隐于其间,亦是十分方便。瑶族巫术花样繁多,巫卜即是一种。常通过占卜定吉凶、决难疑,并以起义、疾病、灾害诸事问之。频仍的不可控灾难从根本上确立的牛卜存在的基础。而且,由于风行牛卜<sup>[9]</sup>,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牛贩的行商路线。当然,也会因牛贩经此,牛或毙于途中,而更加刺激了牛卜的规模。

这是瑶人杀牛的三种场合,前两者和风俗有关。皆体现瑶人对不可知事物的一种态度,由于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且天灾人祸连连,更容易将未来付之上天操控。而选牛做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瑶人对牛的重视。

瑶如何烹饪牛,史料中只有一条记载<sup>[9]</sup>。提及明代瑶族以牛为原料制作的两种食物:贾鬼、牛酱。由牛骨、牛肉特殊烹调而成。

碱水牛骨渍水食之谓“贾骨”。这种做法在清代贵州少数民族中也有,据言柔脆如笋丝,而气味难闻<sup>[10]</sup>。现在广西瑶族亦有食骨之法,但所食为羊骨,将其捣碎拌玉米粉芭蕉根,搓成球状或

煮熟或油炸,称“羊圆骨”<sup>[11]</sup>。

明朝中将牛肚埋在地窟内谓“牛酱”。在今天广西少数民族仍有“牛酱”,而与明代瑶人所言之“牛酱”已有不同。现今广西苗族好食之“牛酱”<sup>[12]</sup>即宰牛时,把牛肠液倒出过滤二至三次,去渣。再把滤得物煮五到十分钟,放入佐料即食。而人类学家提及广西苗有“羊憋”<sup>[13]</sup>,其制作步骤与苗之“牛酱”又略有异,需将羊滤液加至炒熟炖好的牛骨牛肉中食之。而瑶又有一法曰“羊酱”与苗之“羊憋”稍有不同,羊肉青菜不炒而炖之即可。

考察从明至今之情况,会发现有二处不同:

一为烹调方法不同。明清渍骨,而今煮或油炸。明朝窖牛肚,而今倒出肠液再和炒熟或煮熟之肉共食。烹调方法,由原材料和客观条件造成。在原材料差别不大的情况下,需考察当时客观条件。旧为冷食,今为蒸煮炸炒。这和整个食物加工史是十分吻合的——其中即有这样一种现象,由冷食蒸煮炖而至炸炒。究其原因,有两点。首先,由器皿而决定。金属是国家专属,亦是紧缺资源;加之瑶人居处多竹木,故瑶人器皿,多为就地取材,皆为不耐火之温器,即冷食、蒸、煮之用具,不是炒炸之器。其次,瑶人油料来源为麻,而麻又兼二用:一作谷物;一作油料。油脂紧缺,故冷食。现今有炸炒之做法,一因食器已与今汉人无大异;二因瑶山今多栽种茶树榨油,而古时茶主要用来在“互市”时交换紧缺之物。另,现今仍有蒸煮之现象,同上述分析。烹调方法的差异亦是由于所能够拥有的食器质量以及佐料种类数量来决定的。

二为原材料不同。旧时用牛,今多用羊。

## 二、瑶族牛数量减少状况及其原因

宋朝史料,占卜动辄用牛“百十头”,而至明朝,贾骨牛酱就用来款待上宾了。至今,竟是羊骨羊酱了。瑶人牛在减少之中,以至明朝政府将牛作为引诱奖赏瑶人之物。

### 1、瑶族牛减少之历史背景

曾雄生在《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sup>[14]</sup>中言及“中国农业的拓展和劳动者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畜牧业萎缩和牲口减少的过程。”瑶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自然要和其周围大环境发生联系,不会亦不能完全置于趋势之外。宋至明瑶牛减少,而在北宋,牛更多于南宋。虽事物总是共性与特性并存,应具体分析瑶族状况,但这种分析并不是只述瑶况,不

表其它。因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它的大变化,必然更受到其它民族尤其是汉族政府的影响,甚或牵汉族一发而动瑶族全身。

汉人有几次大迁徙发生在瑶牛减少的宋至明间。南宋有一部分移民进入湖南辰州和沅州,使得元至元二十七年比北宋元年人口分别增加7倍和4倍。而今广西、广东西南部和海南所在的广西南路则是南宋户口增加最快的路。明代移民进入了瑶族居住的鄂西南区。湖南是明初移民的主要接纳地,而在瑶族聚居的湘南,有约半数明初迁入移民。进入云南的军籍人口约75万,大大超过了原住民。贵州迁入军籍人口约30万人,与当地土著人口相当。10余万军籍人口进入广西,而有5万驻扎在桂林,约为当地原住民3倍。以上皆是瑶人较多区域。而且,明初移民迁入的地区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主要是补充或重建中心区<sup>[15]</sup>。

宋代瑶人主要分布在今湖南省,次为广西桂北桂东地区及广东北部与湖南相邻和西部与广西相临地区;而辰、沅、靖州是瑶人最重要居住区。元代瑶族居于今湖南沅州、靖州等地,势力所及辰州等地;遍布广西东部与部分西部地区,在广东主要聚居地为与广西接壤的西南部地带,并分布于贵州、云南诸省。至明代,广西成为瑶族最重要的居住地,但与宋代广西瑶区相比,明代广西瑶区的重点则南移到广西大藤峡地区,而湘北瑶人势力大为削弱,湘南成了瑶人的主要居地;贵州瑶多在黔南,而云南瑶多在文山。

两相对比,可见瑶人的迁徙很大程度被汉人的迁徙所左右。汉人进入该地之日,则是瑶人南迁之时。一因北方早已开发之地居民不可能容瑶人夺其田土;二因岭南历来经济力量较薄弱;三因生活生产环境类似较为熟悉<sup>[16]</sup>。明初汉移民的特点决定了,瑶人只能迁徙到尚未开垦且环境恶劣之地。明初军队的驻防调动所形成大规模移民为以后的瑶族粮食短缺埋下伏笔。

## 2. 瑶族牛减少之原因详析

牛减少的过程处于汉人大移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瑶人迁徙背景之下,势必受之影响。

首先,养牛这种行为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水草丰美,才适合牛的生长。而随着南宋以后汉族向南方的移民,瑶族在南方相对优越地带已无立锥之地,逐渐向更偏僻、自然环境更恶劣的地方迁徙。明瑶生存环境日益恶劣,比起僮人,

更远离平地<sup>[17]</sup>,居住深山更深处<sup>[17]</sup>。清更甚,瑶人所居乃平地最少之处<sup>[18]</sup>,仅羊肠一线<sup>[19]</sup>。这样的生存环境。诚如《过山榜》中所言是“赶牛不上”、“牵牛打马不行”之处。此种环境不宜养牛,若养牛,须人时刻牵引,否则,牛举“蹄”为艰,在此养牛必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如浙江人养牛<sup>[20]</sup>,日日悉心倍至。而瑶族所处地贫苦,断不比物产丰富之江浙,以如此之力养牛,必然耽误耕种、打猎。并且此种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且瑶人刀耕火种,无牛可食之物,如何养牛。

另外,土地制度对养牛一会有影响。宋时的土地制度还能保证瑶族拥有一定田地。政府对瑶人“计口给田”<sup>[21-22]</sup>;“不许……以山林陇亩相为交易”<sup>[23-24]</sup>;“不许…汉人…私以产业寄隐”<sup>[25]</sup>,此行为皆因瑶区不征田赋,而汉区征之。并禁止汉民“产寄瑶人户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族豪富的土地扩张兼并,客观上也保护了瑶人田亩拥有量。以上,从制度上确保了瑶人对土地的耕作权。当土地充足时,则需要牛来帮助耕作。而明朝时对瑶人征伐甚多,使其失去土地;且将瑶人土地用来屯兵或招民耕种<sup>[26]</sup>。种种措施,皆使瑶民失去田地。

人均土地量多少亦是否需要牛的一个决定因素。因有瑶人不在户籍,所以无明确数据指明瑶人人口数。但有广西“瑶僮多于汉人十倍”<sup>[27]</sup>之说,而广东据顾炎武所载亦有瑶山八百五十七。另明初曾一次捕斩瑶人三万余人<sup>[28]</sup>,后行修养生息政策<sup>[1]</sup>,而万历年间,又一次性招降瑶人四万二千八百余人<sup>[29]</sup>。皆说明明朝瑶族人口甚多。土地数量少,而人口多,人均土地量就少。田少人众,用人耕地更为经济合理。

另外,养牛应在需要牛,而且保证牛不与人争食之情况下。明瑶土地紧张,耕于罅隙之地<sup>[30]</sup>,且于原不可耕之处开辟,以极力扩大种植面积<sup>[31]</sup>。方圆远近<sup>[32]</sup>、崇山峻岭,皆已遍耕,以养活更多人口。边边角角之处皆植庄稼,无处放牛。

亦有军事性移民之害。瑶人牧地被占据,直接导致牛减少。专门牧牛之地周朝即有,至宋仍有一部分存在。而至明,却被倭兵占据<sup>[33]</sup>。

瑶人因土地紧张、人口增多而过度耕作,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sup>[34]</sup>,无灌木水草,牛几无生理。

以上从生存环境、土地状况以及政府行为等诸角度论述了瑶人牛从宋至明减少之原因。而究其根源,与汉强瑶弱有关。瑶人节节退至穷谷,而



汉人占据良田,但殊途同归。汉人的良田最后也将人口众多的汉人引向了无牛的局面。

哈里斯理论<sup>[39]</sup>认为不同文化中饮食习惯的形成是一种收益最大化过程的结果。可分析:宋瑶人养牛,一是为了耕田,获得植物性食物——因那时土地受到政策保护,数量相对明为多;且田地质量状况较好;人口又比明为少;此时牛作为耕田的助手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植物性食物。但至明而清,土地政策发生了改变,汉人大量移民,占据良田。瑶族人口增加,所得皆是薄田,人地关系紧张。利用一切可利用甚以及难利用之土地耕种庄稼以求活命,不再具备养牛之条件。此时,若强养牛反而浪费人力,无所收益。

二是为了食用——宋时有牧牛之地,而明时无,则丧失了最大的养殖食用牛的可能性;且宋朝亦将老去死去之耕牛作为肉食补充。而至明,以牛耕地全无必要,倘若悉心喂养,仅仅是可以实现作为耕地之牛之外的一个附带价值——换取动物性食物——而动物性食物又可以通过捕猎来获得——且买牛需要一定钱币,而打猎只需猎器即可,获取猎器所需钱币低于买牛之钱币;收获动物性食物数量却大于养牛屠之所得之牛肉。少一专人养牛,则多一专人耕种捕猎,于获取植物性食物以及动物性食物皆有益。这时,不养牛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养牛日少。而使明代瑶民“贪牛之利”了。奇货可居,“牛”亦成了财富化身<sup>[39]</sup>。结语:因为社会地位低下、政策限制,瑶人牛一部分用来换盐,而一部分用来待客。其杀牛行为本身亦因受到朝廷政策的许可才得以实施。而牛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汉族的大移民以及其它政策密切相关,受之左右。其根本症结在于资源的稀缺以及资源分配的严重倾斜。一些看似无关的因素,在此联系起来,展示了瑶汉之间纷争。

#### 参考文献:

- [1]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M].四部丛刊本.
- [2] [清]陆舜臣.议地方事略卷九[M].刻本.1899(光绪二十五年).
- [3] 严如煜.苗防备览[M].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 [4] [宋]洪迈.容斋四笔[M]//四库全书本:卷十六.
- [5] 编辑组.瑶族过山榜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6] [唐]刘禹锡.莫瑶歌[M].
- [7] [后晋]刘昫.旧唐书·食货志上:卷四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宋]朱辅.溪蛮丛笑[M]//“彝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清]闵叙.粤述[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 徐珂.清稗类钞[M].食物类五“贾鬼”条.重庆:商务印书馆,1932.
- [11] 覃乃昌.广西世居民族[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桂林省级分中心.牛酱[DB/OL].[http://data.gil-gx.org.cn:81/cgi-bin/link.exe?3\\$CEC4BBAFC3F1CBD7CEC4BBAFC3F1CBD74E554C4CB9F0CDBC\\*|bid|15497\\*|0|20|1|N|xiang#](http://data.gil-gx.org.cn:81/cgi-bin/link.exe?3$CEC4BBAFC3F1CBD7CEC4BBAFC3F1CBD74E554C4CB9F0CDBC*|bid|15497*|0|20|1|N|xiang#).
- [13] 袁同凯.桂西苗民的佳肴:“羊糞”[DB/OL].[http://tk-yuan.spaces.live.com/default.aspx?\\_c02\\_owner=1](http://tk-yuan.spaces.live.com/default.aspx?_c02_owner=1).
- [14] 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J].中国农史,1999(4):35-44.
- [15] 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16] [宋]蔡戡.定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7] 黄占梅.民国桂平县志·风俗:卷三[M].铅印本.1920(民国九年).
- [18] [清]何福海.新宁县志·疆里表:卷三[M].刻本.1893(光绪十九年).
- [19] [清]佚名.平定瑶匪纪略:上卷[M].油印本.中南民族大学馆藏.
- [20]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 [2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八[M].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2] [元]脱脱.宋史·蛮夷列传二:卷四九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23] [宋]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卷九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4] [宋]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卷七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五:卷三二八[M].万有文库本.
- [26] [清]陆向荣.阳春县志:卷四[M].刻本.1821(道光元年).
- [27] [清]赵尔巽.清史稿·广西土司传:卷五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8] [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十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29] [清]张廷玉.明史·凌云翼传:卷二二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30] [清]查继佐.罪惟录·大藤侯氏:卷三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31] 周学仕.罗定县志[M].铅印本.1935(民国二十四年).

# The musical rhythm of the Ba Nationality

ZHAO Ling

(Music Departmen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rhythm is one of the third musical elements, It is the spirit and soul and only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music of the Ba Nationality. The Ba nationalit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rhythm in music and forcefulness and expressing feeling are the feature of rhythm in the music of courts and masses of the Ba Nationality. The forceful rhythm is decided by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ilitary battles while expressing feeling is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artistic form and style for the esthetic fascination of ruling classes in courts, but in the masses it is mainly showed in folk songs, love songs and other artistic works expressing their folk customs and sentiments. Forcefulness, explicitness, fastness and laying great stress on the spirit of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re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musical rhythm of the Ba N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music of the Ba Nationality;rhythm;court;folk

(上接第 57 页)

[32] 明实录:卷五二[M].校印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3] [清]张廷玉.明史·胡富传:卷一八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4] [清]乾隆.富川县志·水利[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3.

[35] 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36] 明实录:卷二九四[M].校印本.天顺二年八月丁丑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国春)

# Investigations on cattle in Yao nationality historically

REN Bo<sup>1,2</sup>, ZENG Xiong-sheng<sup>2</sup>

(1.Graduat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10;

2.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Cattl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vity and life in ancient China.Previous research focused more on Han nationality and focused little on the cattle in past Yao nationality.To reveal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Yao nationality better,research on consumption,decrease and obtaining of cattle in Yao Nationality historically was undertaken.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and Yao nationality were analyzed.Problems with cattle in Yao nationality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resulted from the scarce of the resource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attle;Han Nationality;Yao Nationality;resource